

竹垞遗响——黄丕烈题跋中的朱彝尊身影

付阿敏¹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朱彝尊学兼众长,喜购藏古籍,为清初著名藏书家,在明末清初乃至整个清代,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黄丕烈作为清中叶的藏书大家,不仅喜藏书、鉴书,且撰有大量题跋。黄丕烈士礼居藏书中,不乏曝书亭旧藏,朱彝尊藏书之身影,藉黄氏题跋,可以管窥一二,从中不难看出曝书亭藏书在清代中叶的传承与影响。

【关键词】: 朱彝尊 黄丕烈 藏书 文献传承

【中图分类号】: I207. 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079(2020)01-0024-06

朱彝尊(1629-1709)系清初大家,集学者与文学家于一身。其著述弘富,藏书达八万卷之多,对清初文献传承,贡献甚巨。^①可惜朱氏身后,家业不振,八万卷藏书,散佚殆尽。这一现象,本身即为学界研究古典文献之传承、文化世家之盛衰,提供了可以深入探讨的论题。

嘉庆三年(1798),以藏书、校勘著称的文献大家黄丕烈(1763-1825)得到一部宋本《咸淳临安志》,于是撰跋文记其始末,其中提及朱彝尊曝书亭藏本:

余向购得钞本《咸淳临安志》,较朱竹垞集中所跋本多二卷,六十五、六十六是也。钞本出卢学士抱经,校本云从鲍以文所藏残宋槧本补录者,然则潜《志》宋刻流传非一也。每从藏书家访问,知竹垞藏本尚在杭州。偶遇杭友曹竹林,询悉是书,即其亲戚所藏。嘱伊访求,已阅三四载矣。今秋九月上旬,以样本示余,余一见,信为宋刻善本。每本部叶有楷书细目,似国初人笔,或即竹垞旧藏亦未可知。物主有议价,及书中刻钞原缺,细数两纸,自署曰“知稼主人”,未识谁何,而于书中面目开列明晰,当是藏书故家。^{[1]122}

黄氏得书后发现与朱彝尊藏本卷数有异,不知是否为曝书亭旧藏,遂留心搜求全本,以验其真。其后通过书友曹竹林得以目验所谓朱氏藏本,但依书本形态亦无法确定是否为竹垞所藏。且因考虑到《曝书亭集》载朱氏所藏《咸淳临安志》共93卷,而曹竹林所出版本为83卷(其中包括10卷钞本),二者卷数相差甚多,恐非同一物,所以仍心存疑虑,并寻求进一步考证。黄丕烈又依据查嗣琛^①《查浦辑闻》所载“杭州府志,在宋则《淳祐志》《咸淳志》。《淳祐》已不复存,《咸淳》则竹垞先生与当湖高詹事士奇合成若干卷,尚缺十卷”,从而断定“余今所见本亦然,其为竹垞故物无疑”^{[1]124}。经过多方考证,黄氏所收版本与查氏所言相合,确为曝书亭藏书。

那么,从朱彝尊到黄丕烈,《咸淳临安志》递传之源流如何?朱彝尊曝书亭八万卷藏书,黄丕烈得以寓目者又有多少?从黄丕烈跋文中,可一窥朱彝尊身影。

一、朱彝尊、黄丕烈所藏《咸淳临安志》

作者简介: 付阿敏(1991—),女,山东临沂人,南京大学文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清代文献学。

朱彝尊、黄丕烈均收藏过《咸淳临安志》，并撰有跋文。黄丕烈所收恰为朱氏旧藏，由此可管窥朱黄二人藏书文化传承之一斑。

《咸淳临安志》是宋度宗咸淳时潜说友^[2]编。此志以《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为基础，旁搜博采，增补成书，共100卷。前15卷为行在所录，记载皇城及中央官署等。16卷以后分列疆域、山川、诏令、御制、秩官、宫寺、文事、武备、风土、贡赋、人物、祠祀、寺观、园亭、古迹、冢墓、恤民、祥异、纪遗等门。该书在宋末有刊本，明代流传几绝。朱彝尊从海盐胡氏、常熟毛氏先后得宋刊本八十卷，并补钞13卷，尚缺7卷。鲍廷博又多方搜补了宋刊本的65、66两卷，为宋本所无，即现存95卷本。今通行本为清道光十年（1830）钱塘汪氏振绮堂仿宋重刊本，较为完备。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四载《咸淳临安志跋》，记述其得书经过，并指出潜氏此志乃宋代幸存地志中较为详备者，对后世地志编纂以及历史文献研究颇为重要：

南宋咸淳四年，中奉大夫、权户部尚书、知临安军府事、缙云县开国男处州潜说友君高，葺正府志，增益旧闻，凡一百卷。予从海盐胡氏、常熟毛氏先后得宋槧本八十卷，又借钞一十三卷，其七卷终阙焉。宋人地志幸存者，若宋次道之志长安，梁叔子之志三山，范致能之志吴郡，施武子之志会稽，罗端良之志新安，陈寿老之志赤城，每患其太简。惟潜氏此志独详，合以《吴越备史》《中兴馆阁录》《续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梦粱录》《大涤洞天志》，庶几文献足征。惜后之作《通志》者，目未睹此，以致旧闻放失，可叹也夫。^{[2]359-360}

黄丕烈收得《咸淳临安志》后因卷数与朱彝尊所藏有异，因此未敢妄下定论，而是多方借读异本，详加考证，最终确定为曝书亭所藏无疑。黄丕烈“书非目睹，凭口说耳食以定是非，断断乎其不可”^{[1]138}，极为谨慎。

由朱彝尊、黄丕烈二跋，可知《咸淳临安志》之递藏源流，即：该书明末由汲古阁散出，朱彝尊藏入曝书亭；之后转经知稼主人^[3]收藏；至乾嘉时期为黄丕烈所收。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散佚，卷数缺失在所难免，清初竹垞所藏版本为93卷，比原本少7卷，至查嗣琛已缺10卷，黄氏所见版本卷数与查氏所见相同。面对古书卷数今昔不同、流传过程中不断散佚的情形，黄丕烈心生感慨：“由是以观，竹垞故物本在杭州，今是书果转传而出者欤？惜卷数册数今昔多寡分合又有不同，岂后人之所为，抑或前人称之不得其实乎？”^{[1]125}此外，自明末至清中叶，此书从常熟汲古阁散入浙江嘉兴、杭州，又转归苏州，《咸淳临安志》之空间流通脉络亦明晰可辨。

二、黄丕烈对曝书亭藏书的发掘与收藏

黄丕烈作为清中期的文献大家，精通版本之学，一生致力于文献典籍的编纂、刊印与流通，在文化史上贡献卓著，影响深远。其藏书在清中叶藏书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当时罕能出其左右，可谓乾嘉时期之最。^[4]黄丕烈不仅喜藏书、鉴书，而且将其心得形诸文字，通过题跋的形式留存下来，有些书甚至一跋再跋。黄丕烈一生所跋古籍有800多种，撰写题跋1000多篇。^[5]朱彝尊藏书之身影，藉黄氏题跋，可以管窥一二。

黄丕烈士礼居藏书中，不乏曝书亭旧藏。黄跋所及朱氏藏书者，除前揭《咸淳临安志》一则外，另有21则：

（1）《汗简》一书，钱塘汪立名所刊，出于竹垞藏旧钞本，旧刻无闻焉。钱遵王《读书敏求记》谓孱守居士藏书率多善本，此殆是也。《汗简》字学中不甚重，潜研老人曾言之。然论古书源流，是书何可废哉？且孱守居士钞于明代，较竹垞所藏更旧，因急收之。

——黄氏跋旧钞本《汗简》三卷、《目录叙略》一卷^{[1]51}

（2）此本有竹垞老人记，未知即《曝书亭集》所跋本否。

——黄氏跋旧钞本《锦里耆旧传》四卷^{[1]99}

(3)考《曝书亭集》宋本《輿地广记》跋,知竹垞所藏仁和吴志伊藏本阙首二卷。

——黄氏跋影宋本《輿地广记》三十八卷^{[1]108}

(4)竹垞藏本序及首二卷从内阁本钞补,并未明言阁本之为刻与钞也。兹获见竹垞旧藏,校此二卷于旧钞本上,有彼此原钞异者,但载其字,其有本同而校补或校改者,悉以朱校识之。——黄氏跋影宋本《輿地广记》三十八卷^{[1]110}

(5)《曝书亭集》云借录于汪编修文升,今香严本卷尾有秋泉居士记,卷中又有彝尊印也。……今而后,知俞郃所云“流传甚少”,竹垞所云“字画粗恶”皆指是本矣。

——黄氏跋明本《长安志》二十卷及《长安志图》三卷^{[1]133}

(6)璜川吴氏本仅留原阙半叶,均未妥协,惟竹垞所见汪文升本原阙。

——黄氏跋明刻本《长安志》八卷^{[1]134}

(7)壬寅(1782)三月,借海宁吴君葵李所藏竹垞钞本校对一过,改正数百字,尚未尽善也。——黄氏跋钞本《长安志》二十卷^{[1]135}

(8)复得溪张氏本,校勘误阙,据枚翁所言,合诸余所藏张本,稍异,洪武、万历时二跋悉有,亦有竹垞跋语,或江藩本所固有也。

——黄氏跋旧钞校本《桂林风土记》一卷^{[1]137}

(9)然竹垞所藏已为钞本,且仅云惜非完书,并未着所缺何处。

——黄氏跋宋槧本《中兴馆阁录》十卷、《续录》十卷^{[1]151}

(10)竹垞跋亦松崖所传也。——黄氏跋旧钞本《五代会要》三十卷^{[1]154}

(11)《乙巳占》一书,《曝书亭集》跋仅云七卷,竹垞以为非完书,而陈氏《书录解题》作十卷,惟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所载与之合。

——黄氏跋旧钞本《乙巳占》十卷^{[1]215}

(12)卷中有“秀水朱氏潜采堂图书”,又知为竹垞藏本。第一、二册部面上犹为竹垞手书,洵可宝也。——黄氏跋明钞本《五行类事占》七卷^{[1]216}

(13)右《古唐类范》一百六十卷,其实即虞氏《北堂书钞》也。《北堂书钞》曾改为《大唐类要》,见于朱竹垞《曝书亭集》跋语中。……此为遵王所记之书尚有可疑,其为竹垞之跋之书则为可信。……未有“秀水朱氏潜采堂图书”、“南书房旧讲官”二方印,则其为竹垞所跋之书一证也。遵王云缮写精妙,竹垞云传写讹误,今是书讹舛则有之,精妙则未也,则其非遵王所记之书又一证也。……竹垞跋系湖州书贾求售者,想当日原书储于浙省,故钱、朱藏家皆能得之。——黄氏跋钞本《古唐类范》一百六十卷^{[1]302}

(14)《鉴诫录》十卷,世鲜传本,惟竹垞翁所收为宋刻重雕足本,其跋见诸《曝书亭集》中,而原书转入徐七来家。——黄氏跋钞本《鉴诫录》十卷^{[1]317}

(15)前有王阮亭、朱竹垞题识,知前人已重为秘本,然余不能无疑焉。

——黄氏跋宋刻残本《归愚集》九卷^{[1]483}

(16)阮亭、竹垞未见原本之旧,故跋语未及。

——黄氏跋旧钞本《侍郎葛公归愚集》十卷^{[1]484}

(17)朱竹垞钞《美合集》一册。六洋四角。——黄氏跋钞本《知非堂稿》六卷^{[1]530}

(18)适又收得枚庵传录本,余作书致渌饮,渌饮以此本见畀,首缺家晋卿序一通,从旧藏朱竹垞藏影写本补全。卷三第四十八页内缺诗一首,复以别纸补录于后,盖竹垞所藏本较为完好,而此本印在后,故首缺序文,中复多脱落也。

——黄氏跋元刻本《道园遗稿》六卷^{[1]532}

(19)是书世行有两本,恭阅《四库提要》,载王阮亭所藏为十四卷,朱竹垞所藏为六卷,则足本诚为艰得也。——黄氏跋明刻本《始丰稿》十四卷^{[1]568}

(20)竹垞翁有才子而天,犹赖笔墨以传,老人为之校订遗稿以行,俾附不朽。

——黄氏跋原稿本《笛渔小稿》七卷^{[1]582}

(21)顾余又有疑焉者,康熙己巳嘉善柯崇朴序云:“乙丑岁至京师,朱检讨竹垞过余寓舍,因以访之。”……则柯所见者,为宋刻甚工之本。

——黄氏跋宋刻本《圣宋文选》三十二卷^{[1]597}

经检,《锦里耆旧传》《輿地广记》《咸淳临安志》《长安志》《桂林风土记》《五代会要》《中兴馆阁录》《乙巳占》诸书,《曝书亭集》均载有朱彝尊所撰跋文,确经朱氏收藏。

朱彝尊学兼众长,既擅诗文书,又精于金石,购藏、借钞、校刻古籍图书不遗余力,为清初著名藏书家,在明末清初乃至整个清代,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四库全书开馆,征书于天下,各地藏书家纷纷进献所藏。此时竹垞已离世60余年,时人尽力搜集曝书亭藏书上呈。经郑伟章考证,《四库全书》共著录曝书亭藏书33种,388卷。^{[3]416}朱氏在藏书及目录学方面的成就令人瞩目,在保存和传承古典文献、促进清代藏书文化发展上的贡献不容小觑。朱彝尊一生购求古书、倾尽其力,可惜朱氏后辈未能善守其藏,曝书亭藏书逐渐散佚,所幸可从黄丕烈题跋中略知一二。由上揭各条跋文,知黄丕烈曾费心搜集曝书亭藏书,使其遗痕不至于消散殆尽。

三、异代知音——朱彝尊、黄丕烈之藏书传承

江南地区拥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优渥的自然人文环境,逐渐成为清代学术文化的中心地带。该地区不仅藏书家众多,且藏书

质量远远超过其他地区。至乾嘉时期,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文化教育得以复兴,图书市场日益繁荣,书坊兴盛,为藏书家提供了良好的藏书环境。苏州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江南地区的学术重地,文献流通渠道众多,学术风气蓬勃向上。嘉庆甲戌年(1814),黄丕烈在旧钞本《芦浦笔记》及《杨公笔录》跋文中记载了苏州当时的书坊发展情况:“余居城西时,惟府东有一书坊,所谓敏求堂是也。既而由府以至按察司前,直至胥门学士街,三十年间书坊之多,几以十数矣。”^{[1]269}此即清代江南地区图书市场之缩影,据此可想见当时藏书文化发展之繁荣景象。

朱彝尊身处明清易代之际,身处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浙江嘉兴,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他尽力编撰、整理古典文献,成果斐然,成为清初文坛的主要代表人物。研究朱彝尊及其藏书对考察清代藏书文化的发展及古典文献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历代藏书家所收古书多有散佚,曝书亭藏书亦难逃此命运。朱彝尊在世时,其藏书即“有借失者,有窃去者,有残缺者”^[4],晚年更是“力不能守,元钞宋刻,雨散云飞”^[5]。朱氏卒后,其孙稻孙贫不能支,曝书亭藏书逐渐散出。黄丕烈诸人嗜好搜求古籍珍本善本,其中多有朱氏旧藏。由清初至乾嘉时期,曝书亭部分藏书辗转散入黄氏士礼居,得以继续流传于世。

黄丕烈藏书题跋中时常流露出面对古籍消亡散佚、恐后继无人之慨叹及对文献传承的强烈期许。嘉庆十八年(1813),黄氏跋稿本《笛渔小稿》七卷曾曰:“余检得此种,明知书非必欲得者而披览之,余顿增伤感。竹垞翁有才子而夭,犹赖笔墨以传,老人为之校订遗稿以行,俾附不朽。余亡儿年逾弱冠,读书未得一衿,篋中只时艺稿存,吟咏之作不及成帙,余又老大无成,自作诗稿,随作随弃,何能更为后人计耶?聊记于此,以当一哭,他日如有桂孙稻孙辈为我守此残编,则儿虽亡犹未亡也。后之人其勉之。”^{[1]582}朱彝尊长子朱德万五岁而夭,《笛渔小稿》为次子朱昆田(文盎,西峻,1652—1699)^[6]所撰,原为10卷。朱昆田少有才名,受家学熏染,能读其父藏书,有“小朱十”之称,可惜“仅四十以死,才人无禄,古今同叹”^[6]。其遗稿由朱彝尊整理成篇,附于《曝书亭集》后,以传于后世。黄丕烈生有三子三女,长子玉堂喜好读书,是黄氏藏书的得力助手,黄氏跋文中经常提及帮忙收书、藏书之事,却不幸于嘉庆九年(1804)病逝。次子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早夭。三子寿凤善声韵,工篆刻,撰有《书印谱》,但也未能守住黄氏藏书。黄丕烈去世后,士礼居藏书即散归各方。朱、黄二氏均有子而夭,藏书无人能守。黄氏《笛渔小稿》跋文情真意切,字字句句流露出对朱彝尊失子的同情,对朱昆田英年早逝的惋惜,对自家后辈学无所成的担忧。面对曝书亭藏书无人能守的境遇,黄丕烈心生伤感,并希望后之来者能够守其藏书,这也是黄丕烈每得一书便撰写题跋的重要原因之一。

朱彝尊也在其《曝书亭著录》序言抒发感慨:“呜呼!今吾子夭死矣,读吾书者谁与!夫物不能以久聚,聚者必散,物之理也。吾之书终归不知何人之手。或什袭珍之,或土苴视之,书之幸不幸,则吾不得而前知矣!”^[4]二人爱惜古书、尽力保存古典文献之心在两个时代形成了呼应,可谓异代知音。

朱彝尊和黄丕烈虽所处时代不同、所藏典籍各异,但在藏书思想以及文献保存上多有相似之处。

首先,尽全力收藏、保存古代典籍,每收一书便多方借钞以补其全。朱彝尊早期游幕各方时,每到一处便走访当地书肆、藏书楼等,为其后藏书活动积累经验。在此期间他购得明代藏书家项笃寿^[7]万卷楼藏书,为曝书亭藏书打下基础。出仕后,其藏书能力较早期大有提升,一是在财力上可以依靠官俸购买书籍;二是为官期间更易钞书,亦可结交其他藏书家(如曹溶、徐乾学等人),藏书渠道更加丰富。朱氏仕清时曾借钞“宛平孙氏、无锡秦氏、昆山徐氏、晋江黄氏、钱唐龚氏”^[4]诸家所藏。黄丕烈及其书友之间经常相互借钞图书,既弥补了藏书家们各自藏书的不足,又增进了彼此间的交流,有利于书籍的流通与文献传承,藏书与乾嘉学术的互动关系就此形成。如,黄丕烈曾向陈鱣借钞宋刻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校对士礼居所藏宋监本,嘉庆丁卯(1807)向陈氏书友借《蜀桤机》进行校勘。

其次,二人均藏而能读、读而能校,藏以致用,最大限度发挥古籍的价值。朱彝尊和黄丕烈不仅嗜好收藏古籍,收藏以后并不是束之高阁,而是不断研读。黄丕烈自嘉庆三年(1798)得《咸淳临安志》一书,至嘉庆七年(1802)数年间曾多次翻阅并撰写跋文,不断考证《咸淳临安志》是否为竹垞旧藏。朱彝尊涉猎广泛,藏书兼及经史子集,《曝书亭集》所收题跋或记载其得书始末或记古籍版本流传、收藏情况等,可略见朱彝尊藏书过程与思想。朱氏跋《五代会要》云:“康熙甲戌(1694)春,复从商丘宋氏借观江西旧钞本,对勘无异”^[7],并对五代时期典章制度略作评说。由此可知,朱氏得书也是多方借钞进行校勘,并注重研究书中内容,而

非置于书架不闻不问。康熙戊子(1708),朱彝尊跋得钞本《桂林风土记》一卷,并跋:“卷尾称获诸钱塘沈氏,是洪武十五年钞传。虽非足本,中载张固、卢顺之、张丛、元晦、路单、韦瓘、欧阳晷、李渤诸人诗,采《唐音》者均未着于录,洽闻之君子亟当发其幽光者也。”^{[2]388}朱氏认为,此本《桂林风土记》所载张固、卢顺之诸人诗歌可补《唐音》之缺。可见,朱氏不仅喜好收藏古书,且能独具慧眼发掘其中的文献价值。

另外,朱彝尊和黄丕烈作为清代杰出的藏书家,二人均致力于古典文献的保存和传承。朱彝尊和黄丕烈二人不仅设有专门藏书楼以放置所收典籍,并依此编成藏书目录。朱彝尊编有《曝书亭著录》《潜采堂宋元人集目录》等,黄丕烈也曾编《求古居书目》《所见古书录》。这些书目对后世研究古代典籍流传、社会历史文化等有重大意义。二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遗余力保护珍本古籍,即使是残篇片语也不忽视。二人都坚持藏书不秘,促进古籍的流通和传阅,希望更大程度上发挥古籍的价值。黄丕烈跋元本《辛稼轩长短句》表示“昔人不轻借书与人,恐其秘本流传之广也。此鄙陋之见,何足语于藏书之道”^{[1]649},可见黄氏流通、传承古籍珍本文献的赤诚之心。

四、结语

王国维论清代学术:“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8]在时间上,朱彝尊和黄丕烈恰处于清初和乾嘉两个时间节点,二人凭借各自藏书,形成了层次丰富的藏书文化交流群体。黄丕烈搜求古籍不遗余力,其所收曝书亭旧藏,既是对朱彝尊藏书的发掘,更是对古典文献的传承。朱黄二人及其藏书,在整个清代学术史中,呈现出一条古典文献的传承脉络。在空间上,以朱彝尊和黄丕烈为代表的藏书家群体,以江浙地区为中心,辐射整个江南地区,并不断向外扩散,推动全国范围内藏书文化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

黄丕烈题跋所涉朱彝尊藏书事迹,在保存前人著述、考证古书授受源流等方面意义重大。诚如黄氏所言,“三百年来一甲子,一书阅过几家人”^{[1]264},一本书经历各朝各代,辗转多处经手多人。正是有朱彝尊、黄丕烈等藏书家致力于文献收藏和传承,才使得部分古代典籍得以保存、流传至今,成为今人取之不竭的思想源泉。

参考文献:

- [1]黄丕烈.黄丕烈藏书题跋集[M].余鸿鸣,占旭东,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2]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四[M]//清代诗文集汇编:1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3]郑伟章.《四库全书》献书人丛考[M]//书林丛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 [4]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五[M]//清代诗文集汇编:1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00.
- [5]钱曾.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M]//管庭芬,章钰,校证.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5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240.
- [6]陶元藻.全浙诗话[M].蒋寅,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1119.
- [7]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五[M]//清代诗文集汇编:1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67.
- [8]王国维.沈乙庵先生寿序[M]//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台湾:大通书局,1976:1162.

注释:

1 关于朱彝尊的学术著述及其对清初文献传承的贡献,详见张宗友《朱彝尊与清初文献传承》一文(《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2 查嗣琛(1652-1733),字德尹,号查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庚辰进士,官侍讲,后因兄嗣庭罪谪遣关西,死于戍所。少时受业于黄宗羲,工诗,与查慎行齐名,有《查浦诗钞》。

3 潜说友,字君高,处州缙云人,淳祐辛丑进士。咸淳二年(1266)授两浙转运判官,三年(1267)迁副使,九年(1273)兼浙西提举。

4 黄丕烈所收《咸淳临安志》署有“知稼主人”,黄丕烈书友曹竹林认为是王学增,鲍廷博云:“书虽未见,然闻其为黄姓物,所称知稼主人,当用宋人知稼翁故事。”(黄丕烈撰,余鸿鸣、占旭东点校,《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125页。)后黄丕烈得《夏季摺绅》,其中载有王学增事,乃知鲍廷博所说为误。

5 叶昌炽云:“乾嘉以来,藏书家当以先生为一大宗。”(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附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73页。)陈登原指出:“昔人谓乾嘉以来藏书家,当以丕烈为大宗,而乾嘉间之藏书史,可谓百宋一廛之时代,允矣。”(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书店,1983年,第341页。)

6 光绪十年(1884),潘祖荫最先刊成《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六卷。此后缪荃孙、江标、王大隆等人继续补充辑佚,黄丕烈题跋收集与整理工作如王大隆所言:“虽不敢谓无遗,而尧圃精力所聚,亦略备矣。”(王欣夫《尧圃藏书题职再续录跋》,《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清代卷第七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346页。)

7 朱昆田其人详张宗友《朱彝尊年谱》,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50-51。

8 项笃寿(1521—1586),字子长,号少溪,别号兰石主人,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明代著名藏书家,筑有万卷楼,喜收藏和刊刻图书,并长于鉴别字画。